

跨境电商、政府关注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郭 飞 郭慧敏

摘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之一。在这一背景下,跨境电商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能否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亟待实证检验的核心问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城市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探究跨境电商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试点建设提升了试验区内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该提升作用在高新技术行业与民营企业中更突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跨境电商试点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词频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在物流、创新、数字、融资和人才方面的关注能够增强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跨境电商试点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及政府关注的强化作用,为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找准政策发力方向。

关键词:跨境电商 企业新质生产力 政府关注 高水平对外开放 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279.2;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3-0036-16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加码,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多重风险挑战。跨境电商可以突破贸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1],加之其具有低成本、便利性、安全性^[2]等特征,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中国一直将跨境电商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从税收、跨境服务、外汇业务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跨境电商发展”。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12年提及跨境电商,凸显中国对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视。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政府应对国内外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新质生产力是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依托新要素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其核心驱

收稿日期:2025-08-07;修回日期:2026-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银行监管和会计监管协调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决策与信贷资源配置研究”(20BJY02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央地合作战略下央企参股对北京市属国企创新及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24JJC031)

作者简介:郭 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3;

郭慧敏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通信作者,北京,10012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动力在于关键性新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之一,数字化为劳动资料提供了“新介质”。数据具有流动性、虚拟性,新质生产力把数据作为驱动经济运行的新质生产要素,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质态^[3]。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深度应用的产物,跨境电商不仅更新了交易方式和手段^[4],也因其数字化特征与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属性高度契合,对推动生产力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传统企业通过加持跨境电商的数字技术,不仅提高了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还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推动商品贸易向虚拟化、精细化、品牌化和定制化发展,开辟了国际贸易的新赛道,体现了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共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的方向,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空间。

在政策层面,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的制度安排,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正是国家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主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举措。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中央政府逐步推进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自2015年起,国务院以城市为单位推行跨境电商试点政策,旨在构建涵盖跨境支付、通关、退税等环节的制度框架与技术标准,为深化对外开放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截至2022年底,先后分七批设立了165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表1所示。该政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提高了其生产效率^[5],还促进了人才、技术与资金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集聚,为企业推进模式创新与产品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6]。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发挥关键作用^[7]。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与之相契合的生产关系因素,体制机制的支撑和配合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条件。跨境电商试点政策正是为破解跨境电商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而出台的重大实践举措^[2]。不同于以往聚焦于技术特征的跨境电商政策,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从变革制度属性出发,开展的简化申报、“无票免税”、通关监管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构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提升了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水平^[8]。

表1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及相关内容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相关政策内容
2015年3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5]44号)	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破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16年1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6]17号)	在天津市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更加便捷高效的新模式释放市场活力,吸引大中小企业集聚,促进新业态成长,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就业,支撑外贸优进优出、升级发展
2018年7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8]93号)	在北京市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
2019年12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9]137号)	在石家庄市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开展品牌建设,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业态创新,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2020年5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20]47号)	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表1(续)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相关政策内容
2022年1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等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22〕8号)	在鄂尔多斯市等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2022年11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廊坊等33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22〕126号)	在廊坊市等33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挥跨境电子商务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外贸优化升级,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遗憾的是,尽管跨境电商作为贸易数字化的典型代表,能够借助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平台打破信息壁垒、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并推动产业创新,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蓄势赋能,但以往文献尚未关注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尤其缺乏从微观视角出发,对二者内在机制进行严谨的定量分析,并未打开该政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黑箱”,更没有立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如何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这导致难以全面深刻认识新旧贸易业态转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塑效果。因此,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为检验跨境电商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契机。

本文依据各批次试验区设立的时间,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上市公司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其作用机制、政府关注度的交互效应以及行业属性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厘清了跨境电商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理论机制,丰富了跨境电商企业微观效应方面的研究^[9-10]。本文将贸易新业态纳入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以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作为事件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精准评估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而且,基于技术助力和治理驱动的双重维度,考察了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阐明了制度创新在企业层面产生积极经济效应的内在逻辑。二是揭示了政府关注在跨境电商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强化效应,拓展了政府关注的经济后果研究^[11-12]。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不同政策议题的关注度直接影响地方资源分配方向^[13]。本文将政府关注引入新质生产力领域,揭示了政府关注在企业生产力提升方面的经济效应,丰富了政府关注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三是从企业微观层面对现有新质生产力研究进行补充,证实了开展跨境电商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量。现有新质生产力的实证研究已逐渐由宏观经济研究^[14-15]拓展到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微观研究^[16-17]。本文以存在出口业务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跨境电商试点这一外生冲击事件,考察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并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丰富了微观层面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 新质生产力的度量与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8]。早期的新质生产力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学者们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三者优化组合的质变^[19],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研究范畴内,进一步阐释了“高素质劳动力”“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

劳动对象”的提升,是如何共同作用并构成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形态的。也有学者提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新”的表现^[20]。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后续研究开始尝试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度量体系并开展实证检验^[14]。该类研究早期以宏观经济研究为主,包括经济增长^[14]、产业结构升级^[15]等宏观方面,随后逐步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研究^[16-17]。例如,温科和李常洪基于生产力要素理论,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两个层面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21]。从劳动者层面来看,新质劳动者范畴涵盖高素质人才。从劳动资料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主要采用创新性更高、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利用该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上述学者发现数实技术融合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微观层面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

企业是创造新质生产力的微观主体,从旧质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难点与堵点。因此,相关研究更加关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政策与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二) 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

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已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清晰演进脉络。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跨境电商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框架,为后续分析提供政策背景。例如,马述忠和郭继文以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宏观视角揭示了制度创新对跨境电商出口的推动作用,凸显了政策工具在培育贸易新业态中的关键作用^[2];鞠雪楠等基于“敦煌网”微观平台数据,精准识别了跨境电商在降低信息搜寻与契约执行等贸易成本方面的具体机制,首次阐释了其缓解贸易摩擦的可行路径^[5];张洪胜和潘钢健进一步将研究拓展至国际维度,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政策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为理解政策的跨境溢出效应提供了重要依据^[10]。刘珊等将研究延伸至城市层面,验证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为理解贸易新业态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8]。上述研究共同构建了宏观层面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经济后果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微观层面的研究则深入探讨了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具体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刘海云等发现试点政策提升了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效率视角揭示了其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赋能路径^[9];李向前等、刘政等论证了试点政策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进程和技术创新^[22-23]。张夏恒进一步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数字贸易,将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作为自然实验,证实了数字贸易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24]。

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企业绩效的多个维度,但仍存在三个关键局限:一是宏观层面的研究虽已关注到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但未将该视角引入企业层面进行分析,也未构建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二是未能打开该政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黑箱”,尤其是制度创新如何通过技术赋能与治理提升等路径解决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难点;三是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政策效果,尚未考察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与其他制度的协同效应,难以全面揭示在复合政策环境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基于上述研究空间,本文聚焦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旨在从理论构建、机制识别与政策协同三个层面完善现有研究,为理解制度创新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制度创

新和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7]。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正是中国政府为适应数字时代全球化新趋势而推出的一项深刻的制度创新,引发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该政策以城市为试点单元,围绕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产业园区两大平台,构建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信用管理、统计监测和风险控制六大体系,形成了一套适应跨境电商发展的制度框架。通过系统性构建以“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以“无票免税”和便利化通关等具体措施为表征的新型贸易治理体系^[2],旨在破除传统贸易体制下交易成本高昂、要素流动不畅等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这一制度变革,通过重塑贸易规则与商业环境,为微观企业主体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关键的制度保障。

宏观层面上,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5],为生产要素(尤其是数据、技术、人才等新质要素)的高效配置与组合提供制度保障。微观层面上,它通过重构市场准入、监管流程与服务体系,实质性地改变企业的外部约束与竞争激励,从而深刻影响企业的行为与发展^[22]。因此,跨境电商试点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宏观基础与微观机制。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跨境电商试点建设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而言,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新质生产力。

首先,新质生产力是数字化时代下结合了新要素而形成的生产力,主要以关键性技术创新为突破节点^[3],而跨境电商试点建设通过塑造良好的对外开放软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数字环境与平台支持,进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新时代数字技术的运用,数字产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起到了产业规模赋能、产业链条赋能、产业结构赋能的作用^[25]。“无票免税”是跨境电商试点建设中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数字化、信息化的流程制度在海关申报、出口退税、检疫等多环节为企业的跨境电商贸易带来便利,优化了企业的数字发展环境。从资源整合视角来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内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对外整合全球要素市场,推动生产资源和高级要素集聚,吸引数字化人才流入。优化的数字环境与聚集的数字人才是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基础^[22],能够更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26]。因此,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实施,加快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跨境电商试点建设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其次,公司治理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27-28],而跨境电商试点政策通过提供技术支持与强化外部监管,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治理环境。跨境电商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记录和更新经营数据,提升了企业内部信息的可追溯性与透明度。电子商务所依托的数字技术促进了信息的高速流通与共享,使得企业的财务状况、市场动态和运营信息更为公开透明^[24],从而强化了内部治理的信息基础。更重要的是,跨境电商试点政策通过建立标准化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将通关、结汇、退税等关键贸易环节纳入统一、透明的数字化监管流程,从制度与技术双重层面,系统性地规范并确保企业运营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源头上大幅提升了企业内部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与可靠性,明显提高了信息质量。与此同时,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外界对试点企业的关注度。为规避潜在的声誉风险与监管处罚,企业管理层有动机主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抑制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29],增强了公司治理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因此,跨境电商试点建设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发挥了公司治理效应,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跨境电商试点建设通过完善公司治理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政策资源的视角,学者们对政府关注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后果展开一系列研究。企业环保方面,游家兴等发现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通过提供政府环保补贴促进企业环境治理^[11]。企业创新方面,李佳霖和董嘉昌、赵星等的研究分别证实了政府关注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13]与交互效应^[12]。此外,还有学者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关注的经济效应^[30]。

从资源再分配的视角来看,政府对某一领域关注度提升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并推动相应的行动,实现资源向该领域的再分配,这有助于相关企业获得资源优势,提升其生产力水平,即所谓的“资源效应”^[11,13]。例如,政府对物流体系及融资渠道的重视会推动当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31-32],为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实施提供基础设施与资金支持,强化该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从制度协同的视角分析,政府关注能够放大政策实施的整体效果。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单一政策,复合政策因其协同效应能产生更明显的赋能效果^[33]。理论上,政府关注不仅体现为资源倾斜,还通过构建多层次政策体系、优化制度环境,形成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格局,从而放大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整体效果。例如,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顺利实施,既依赖于物流、金融等资源的配套支持,也离不开多个政府部门在创新激励、数字化建设与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协同配合。因此,在资源与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政府关注能够强化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政府关注能够强化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四、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主要针对通过跨境电商途径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宋科等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出口企业具有显著影响^[34]。基于此,本文以企业是否存在出口业务,即海外销售收入,作为关键筛选标准,选取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中具有出口业务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若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SMA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并按照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ST和*ST企业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样本;(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样本。最终,本文得到16658个有效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设定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Npro_{i,t+1}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X'_{i,t} \delta + \beta_i + \gamma_t + \theta_k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新质生产力($Npro_{i,t+1}$)表示企业*i*在第*t+1*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政策试点($Treat_i$)为企业是否处于跨境电商试点试验区内的虚拟变量,政策施行($Post_t$)为企业所在地区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实施时点的虚拟变量, $X'_{i,t}$ 为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 β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γ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θ_k 为城市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使用新质生产力($Npro_{i,t+1}$)表示企业*i*在第*t+1*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计算方法参考温科和李常洪^[21]

对上市公司新质生产力指标的度量过程,采用熵值法对企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计算。计算指标详见表 2。

表 2 上市公司新质生产力的计算指标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说明	权重比/%
劳动力	活劳动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工资薪酬)/营业收入	28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4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以上人数/员工人数	3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2
		制造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工资)/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	1
生产工具	硬科技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27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租赁费用)/营业收入	2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28
	软科技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3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1
		权益乘数的倒数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1
		新质生产力		

2. 解释变量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始于 2015 年杭州市,初步对跨境电子商务的新业态进行了摸索创新,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试点经验。随后,相关经验推广至全国各省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分批次建立,为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本文将政策时间点($Treat_i \times Post_t$)设为解释变量, $Treat_i$ 为分组虚拟变量。根据城市来划分是否设立跨境电商试验区,将注册地位于试验区所在城市的上市企业作为处理组,定义为 1,其他企业为控制组,定义为 0; $Post_t$ 为时间虚拟变量,将各城市试验区设立当期及之后时间定义为 1,设立之前的时间定义为 0。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包括:企业规模($\ln Size$),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为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企业产权性质(SOE),用以衡量是否为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用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现金流比率($Cashflow$),用以衡量企业营运能力及偿债能力;董事人数($\ln Board$)和两职合一($Dual$),用以衡量企业治理状况;股权制衡度($Balance$),为第二到第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成立年限($\ln Age$),企业成立年份取自然对数;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用以衡量管理层对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影响程度;是否由四大审计事务所审计($Big4$),衡量企业是否由四大审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企业创新效率(Eff),采用对数化的专利获批数量与对数化的研发费用的比值;各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ln GDP$),用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①。

① 为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及控制变量度量偏差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额外控制了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总资产),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托宾 Q 值(公司市值/账面价值)、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地区市场化水平(地区市场化指数,存在缺失值的年份按地区的平均增长率补齐)以及工业化水平(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结果显示,在引入上述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Treat \times Post$)的回归系数仍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稳健。因篇幅限制,该部分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留存备索。

(四)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的均值为5.220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4.3880和0.6926,表明样本企业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该结果与既有研究^[26]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基本一致。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2860,表明28.6%的样本企业为国有企业。进一步观察控制变量发现,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董事会平均人数约为8人,管理层持股比例均值约为15.89%,反映出样本在治理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多样性。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Npro</i>	16 658	5.220 1	2.264 9	4.893 9	0.692 6	14.388 0
解释变量	<i>Treat×Post</i>	16 658	0.436 1	0.495 9	0	0	1
控制变量	<i>Size</i>	16 658	1.236 0×10 ¹⁰	3.202 0×10 ¹⁰	3.592 0×10 ¹⁰	4.461 0×10 ¹⁰	2.621 0×10 ¹⁰
	<i>Lev</i>	16 658	0.412 5	0.195 2	0.404 4	0.007 5	1.094 2
	<i>SOE</i>	16 658	0.286 0	0.451 9	0	0	1
	<i>ROE</i>	16 658	0.066 6	0.121 8	0.071 4	-0.663 9	0.381 3
	<i>Cashflow</i>	16 658	0.048 1	0.064 4	0.046 1	-0.154 6	0.244 3
	<i>Board</i>	16 658	8.420 6	1.571 2	9	5	14
	<i>Dual</i>	16 658	0.312 5	0.463 5	0	0	1
	<i>Balance</i>	16 658	0.763 0	0.600 4	0.618 3	0.029 9	2.824 7
	<i>Age</i>	16 658	18.670 0	5.602 8	18	7	34
	<i>Mshare</i>	16 658	15.889 0	20.229 0	3.338 7	0.000 0	67.750 0
	<i>Big4</i>	16 658	0.052 5	0.223 1	0	0	1
	<i>Eff</i>	16 658	0.021 1	0.059 3	0.000 0	0.000 0	0.286 8
	<i>GDP</i>	16 658	12 093	10 629	8 006.600 0	153.410 0	43 215.000 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4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列(2)分别汇报了未控制固定效应和控制固定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未控制固定效应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在加入固定效应以及一系列的控制变量之后,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初步说明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试验区内上市公司的新质生产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假设1通过了检验,即跨境电商试点建设有助于企业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Treat</i> × <i>Post</i>	0.565 5*** (8.278 0)	0.125 1*** (2.868 4)
<i>lnSize</i>	0.162 7*** (3.913 5)	0.228 8*** (3.732 8)
<i>Lev</i>	-1.246 2*** (-5.028 0)	0.141 0 (0.611 1)
<i>SOE</i>	0.422 2*** (3.647 0)	0.120 2 (0.873 7)
<i>ROE</i>	-0.869 8*** (-3.741 5)	-0.592 7*** (-4.864 1)
<i>Cashflow</i>	3.221 7*** (7.405 8)	0.483 0** (2.086 2)
<i>lnBoard</i>	-0.059 5 (-0.274 9)	-0.174 6 (-1.103 3)
<i>Dual</i>	0.124 6* (1.675 1)	-0.082 6* (-1.700 8)
<i>Balance</i>	0.140 6** (2.210 5)	-0.089 5 (-1.254 0)
<i>lnAge</i>	0.093 1 (0.761 3)	0.053 0 (0.146 0)
<i>Mshare</i>	-0.001 6 (-0.780 3)	0.002 1 (0.894 1)
<i>Big4</i>	0.467 4** (2.127 6)	0.218 8 (0.992 9)
<i>Eff</i>	2.356 9*** (5.003 3)	0.230 2 (1.150 3)
<i>lnGDP</i>	0.133 3*** (2.941 3)	0.117 4 (0.555 7)
常数项	0.128 0 (0.116 3)	-0.777 7 (-0.313 1)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658	16 658
\bar{R}^2	0.065 7	0.788 4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后表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需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用以检验上市公司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否在跨境电商试点建设之前就已经存在。基于此,本文将首次设立跨境电商试验区的前一年(2014年)作为基准年,分别加入设立前五年($Treat \times Post_{t-5}$)至前二年($Treat \times Post_{t-2}$)、当年($Treat \times Post_t$)、设立后第一年($Treat \times Post_{t+1}$)至第三年($Treat \times Post_{t+3}$)共8个时间虚拟变量。以虚拟变量 $Treat \times Post_{t+1}$ 为例,当 $Treat \times Post_{t+1} = 1$,则表明观测样本企业所在地处于跨境电商试点实施的后1期,否则 $Treat \times Post_{t+1} = 0$,其他时间虚拟变量以此类推。图1为平行趋势动态图,可以看出,在2015年之前,回归系数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但在2015年之后,处理组相比控制组回归系数明显上升,且显著大于0。因此,本文认为模型(1)中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满足平行趋势,符合双重差分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

(三)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取了不同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抽样1000次构建“伪政策虚拟变量”进行重新估计,降低了结果受随机因素影响的可能性。(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法。采取邻近匹配法,以1:1和1:2的方式为处理组企业重新匹配控制组,缓解样本选择性偏误。(3)控制同期政策的干扰。分别以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政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均不显著,同时通过控制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剔除高互联网渗透省份样本,排除“互联网+”行动的干扰。(4)检验外贸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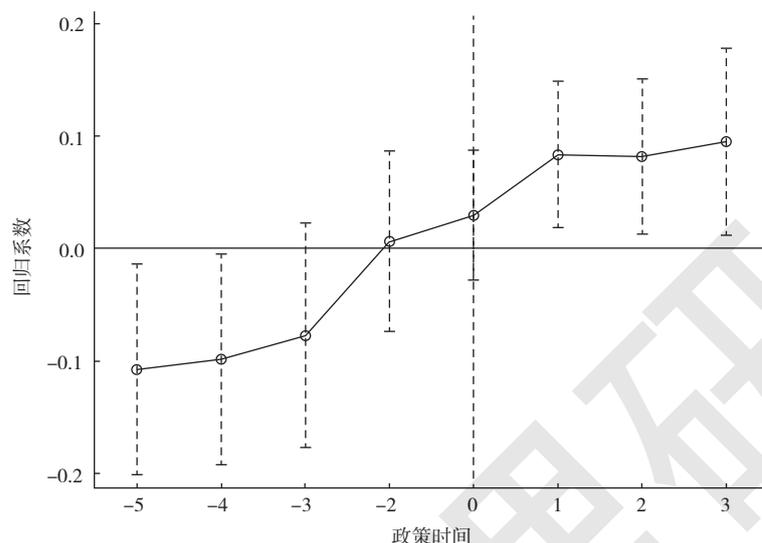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素的影响。剔除港口城市、口岸城市(设有海关口岸的内陆边境城市)样本及外贸高增长年份(样本区间内,出口同比增速较高的2012年、2018年和2021年)后,结论依然稳健。(5)更改聚类层级。将标准误的聚类层级更改为行业层面,结果依然稳健。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跨境电商试点建设能够促进试验区内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文的核心结论保持稳健。^①

(四) 机制检验

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跨境电商试点建设能够促进试验区内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进一步厘清跨境电商试点建设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技术助力与治理驱动两个方面,借鉴江艇^[36]的机制检验方法设定模型对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Mechanism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X'_{i,t} \delta + \beta_i + \gamma_t + \theta_k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Mechanism$ 为机制变量,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和企业信息质量($Quality$),分别采用企业数字经济专利数量和盈余激进程度衡量。

首先,本文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为跨境电商试点建设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机制。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35]。跨境电商试点的实施,能够通过优化数字环境与集聚数字人才,为试验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进而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本文采用数字经济专利数量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该值越大代表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表5列(1)报告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策虚拟变量($Treat \times Post$)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控制组,处理组企业样本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明显提高。由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即跨境电商试点建设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新质生产力,证实了技术助力路径。

其次,本文检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是否为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另一条作用机制。良好的公司治理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7-28]。电子商务主要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为

^① 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部分的详细结果留存备案。

完善公司治理奠定基础。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为试验区内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提供制度便利,同时提高其外界关注度,进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完善公司治理,最终促进其新质生产力发展。考虑到跨境电商试点建设主要通过信息透明度渠道影响公司治理,本文以盈余激进度作为企业信息质量的衡量变量,该数值越大代表企业信息质量越低、公司治理水平越差。表5列(2)汇报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策虚拟变量($Treat \times Post$)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企业样本的信息质量明显提升,公司治理状况改善。由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跨境电商试点建设通过提高企业信息质量进而提升其新质生产力,证实了治理驱动路径。

表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reat \times Post$	0.0451** (2.2993)	-0.0112** (-2.4335)
常数项	-4.0896*** (-3.6449)	-0.0931 (-0.41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658	16658
\bar{R}^2	0.6611	0.4670

注:列(1)和(2)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Digital$ 、 $Quality$ 。

(五) 交互效应分析

对于跨境电商而言,物流、创新、数字、融资、人才五个维度与其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在上述维度的关注有助于引导资源聚焦,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提升试点政策的整体效能。

具体而言,第一,物流问题是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面临的难题之一,由于跨境电商订单种类繁多、交易频繁、包裹数量庞大等客观现状,其对物流运力及效率的要求均高于其他行业^[2,31,37],因此政府对物流的关注为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实施提供物流基础,如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加快通关节奏,

能够有效助力企业加快商品周转,降低物流成本,强化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效果。第二,科技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由于企业的业态差异与行业差别,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与资金投入存在差异,导致其能够获得及使用的发明专利、实用技术存在差异。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关注一方面能够鼓励其进行研发投入与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其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增强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第三,“无票免税”是跨境电商试点中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数字化、信息化的流程制度能够在海关申报、出口退税、检疫等多环节为企业的跨境电商贸易带来便利。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电商生态体系能够促进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实施^[37]。政府对企业数字技术的关注一方面能够鼓励其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其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增强试点政策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第四,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发展境外业务的主要因素^[32],政府对企业融资的关注能够缓解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问题,进一步放大试点政策的积极效果。第五,企业在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时,需要信息化储备较强的人才管理队伍^[38]。政府对人才方面的关注能够有效吸引高素质人才集聚于试验区,为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实施提供助力。

由于各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对各领域的关注度也各不相同。本文重点考察这种地方关注度差异与跨境电商试点政策效果之间的交互效应。因此,为检验政府关注交互下跨境电商试点政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规律,本文选取物流、创新、数字、融资、人才五个维度的政府关注,应用爬虫软件 Python 对 2011—2022 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挖掘,分别以物流、创新、数字、融资、人才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即关键词出现次数+1 并取自然对数,以及词频占比,即关键词出现次数占报告词频总数的比例,作为各维度政府关注的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将各指标按年度中位

数生成虚拟变量(*Innovate*),在模型(1)的基础上,采用三重差分法进行分析,通过观察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变化作进一步探讨,模型如下:

$$Npro_{i,t+1} = \alpha_0 + \alpha_1 Innovate_{i,t} + \alpha_2 Treat_i \times Post_t + \alpha_3 Treat_i \times Innovate_{i,t} + \alpha_4 Post_t \times Innovate_{i,t} + \alpha_5 Treat_i \times Post_t \times Innovate_{i,t} + X'_{i,t} \beta + \beta_i + \gamma_t + \theta_k + \varepsilon_{i,t} \quad (3)$$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物流维度,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对物流方面的关注强化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①。这意味着加快物流运输周转的实施方案,能够帮助企业缓解开展跨境业务时面临的运输难题,对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帮扶作用。在创新维度,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关注强化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实施方案,能够帮助企业获取与跨境业务相关的新技术,助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数字维度,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数字关注强化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实施方案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融资维度,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对融资方面的关注强化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涉及融资的采取措施能够起到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人才维度,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对人才方面的关注强化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政策中涉及人才的实施措施可以起到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表6 交互效应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物流		创新		数字		融资		人才	
	频次	占比								
<i>Treat</i> × <i>Post</i> × <i>Innovate</i>	1.065 6***	0.968 0***	1.163 7***	1.121 7***	0.993 1***	0.983 9***	1.008 2***	0.995 5***	0.898 9***	0.907 4***
	(17.705 3)	(16.256 7)	(16.852 8)	(17.190 5)	(16.701 2)	(17.375 8)	(17.738 7)	(18.392 9)	(15.570 0)	(16.361 4)
<i>Innovate</i>	-0.010 9	-0.063 4	0.022 9	0.043 2	0.050 8	0.028 7	0.005 5	-0.043 9	0.031 8	0.063 9
	(-0.207 3)	(-1.240 9)	(0.418 0)	(0.750 0)	(0.749 6)	(0.480 3)	(0.104 4)	(-0.890 2)	(0.619 5)	(1.120 6)
<i>Treat</i> × <i>Post</i>	-0.869 5***	-0.828 2***	-1.036 0***	-1.011 1***	-0.851 3***	-0.866 9***	-0.860 9***	-0.863 1***	-0.812 4***	-0.835 9***
	(-18.212 5)	(-16.698 5)	(-18.025 1)	(-18.126 8)	(-18.288 3)	(-18.965 3)	(-18.551 8)	(-18.918 9)	(-17.061 4)	(-17.679 0)
<i>Treat</i> × <i>Innovate</i>	-0.513 1***	-0.425 9***	-0.632 2***	-0.606 1***	-0.550 9***	-0.533 3***	-0.526 4***	-0.467 0***	-0.504 2***	-0.506 1***
	(-7.527 0)	(-6.409 3)	(-8.233 0)	(-8.210 9)	(-6.981 8)	(-7.370 9)	(-7.859 8)	(-7.458 0)	(-7.415 0)	(-7.242 7)
常数项	-3.823 3	-3.979 4	0.134 8	-0.840 9	-0.036 4	0.377 1	-4.010 5*	-4.555 5*	-2.215 0	-2.719 0
	(-1.583 7)	(-1.636 9)	(0.056 0)	(-0.346 0)	(-0.015 1)	(0.156 3)	(-1.657 8)	(-1.885 5)	(-0.908 1)	(-1.108 6)
控制变量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① *Post*×*Innovate* 的回归系数因多重共线性无法估计,特此说明。

表6(续)

变量	物流		创新		数字		融资		人才	
	频次	占比								
样本量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16 594
$\overline{R^2}$	0.800 5	0.799 2	0.801 6	0.801 3	0.799 4	0.799 6	0.799 4	0.799 2	0.798 1	0.798 3

综上,本文从物流、创新、数字、融资、人才五个维度对跨境电商试点建设能否有效促进试验区内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关注有效增强了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假设4通过了检验。

(六) 异质性分析

不同的行业属性分析及产权性质,导致企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不同,即同一政策对不同行业及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相较于传统制造行业,高新技术行业受贸易摩擦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该行业企业对贸易类政策更为敏感,能够更好地利用该类政策促进自身发展。因此,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传统制造行业组和高技术行业组,以检验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差异。此外,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对市场信号反应敏捷,能够迅速捕捉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依托数字化平台带来的贸易便利化等机遇,从而利用该政策促进自身发展。因此,本文依据产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分为民营企业组和国有企业组。分样本检验的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在高新技术行业及民营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传统制造行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不显著。邹(Chow)检验证实了组间系数存在差异,即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及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①。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行业属性		产权性质	
	传统制造行业	高新技术行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Treat \times Post$	0.087 9 (1.099 6)	0.134 3** (2.463 9)	0.126 8** (2.313 8)	0.072 1 (0.766 9)
常数项	1.793 5 (0.336 8)	-0.706 8 (-0.230 3)	-2.292 0 (-0.683 4)	-3.395 5 (-0.645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994	9 917	9 963	3 957
$\overline{R^2}$	0.752 8	0.807 6	0.782 1	0.813 3

① 为考察高新技术行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高是否由跨境电商试点政策推动,本文设置哑变量 $High_Tech$,企业所处行业为高新技术行业则为1,否则为0,在模型(1)中加入 $Treat$ 、 $Post$ 以及 $High_tech$ 的三重差分项,结果显示,该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试点建设提升了高新技术行业的新质生产力。由于篇幅所限,该结果留存备案。

表7(续)

变量	行业属性		产权性质	
	传统制造行业	高新技术行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邹检验 P 值	6.69***		6.30**	
	0.0012		0.0121	

注:组间差异检验 P 值采用邹检验计算得出。

六、结论与建议

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跨境电商作为稳外贸的关键抓手,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跨境电商试点政策随着电子商务业态的逐步成熟而设立,对试验区内企业开展相应业务起到较好的帮扶引导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发展。本文借助跨境电商试点这一外生冲击事件,利用多期 DID 模型考察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对政府关注能否有效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试验区内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技术助力和治理驱动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在物流、创新、数字、融资、人才五个维度的关注明显增强了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高新技术行业及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

本文分析了跨境电商试点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不同于以往有关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微观效应方面的研究,本文强调跨境电商试点引发了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完善,为理解制度创新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此外,本文还对政府关注如何影响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拓展了政府关注的研究边界。同时,本文响应了宋正雯等^[16]、叶云岭和张其仔^[17]等学者将新质生产力研究由宏观论述推向微观实证的呼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试点的覆盖区域,以跨境电商业务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扩大跨境电商试点区域的覆盖范围,是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扩大试点范围,更多企业可以受益于政策驱动的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试点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将加速数字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的普及,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继续加大政府在物流、创新、数字、融资和人才五个方面的关注及资源倾斜,强化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在物流、创新、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和人才发展等关键领域的关注与资源倾斜,是强化跨境电商试点建设对企业发展积极影响的重要保障。例如,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发展的投资可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定向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可缓解资源约束,促进高技术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创新,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持。第三,依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跨境电商发展战略,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企业因行业和自身特征存在差异,其对跨境电商的响应能力不同。因此,需制定差异化策略,如定制化数字化转型计划、行业特定政策支持和针对性人才发展计划,以提升跨境电商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效果。通过精准资源配置,确保不同行业企业均能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DINERSTEIN M, EINAV L, LEVIN J, et al. Consumer price search and platform design in internet commer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7): 1820-1859.
- [2] 马述忠,郭继文. 制度创新如何影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 ——来自综试区设立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2, 38(8): 83-102.

- [3] 刘志彪, 凌永辉, 孙瑞东. 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1): 59-66.
- [4] 刘玥, 刘能毓, 沈鸿. 探索企业出口贸易网络发展新路径——来自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微观证据[J]. 财经研究, 2024, 50(12): 107-121.
- [5] 鞠雪楠, 赵宣凯, 孙宝文. 跨境电商平台克服了哪些贸易成本? ——来自“敦煌网”数据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20, 55(2): 181-196.
- [6] 金泉, 苏庆新. 跨境电商平台赋能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机制研究[J]. 国际贸易, 2022(10): 68-76.
- [7] 刘伟.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 经济研究, 2024, 59(3): 4-11.
- [8] 刘珊, 马莉莉, 郭家琛. 贸易新业态何以赋能新质生产力——来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5(5): 26-46.
- [9] 刘海云, 王利霞, 王雪峰. 跨境电子商务与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研究, 2024(7): 43-57.
- [10] 张洪胜, 潘钢健. 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 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21, 56(9): 141-157.
- [11] 游家兴, 于明洋, 曹旭, 等. 政府环境关注与企业环境治理——基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的视角[J]. 管理评论, 2024, 36(5): 235-247.
- [12] 赵星, 李若彤, 贺慧圆. 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吗? [J]. 科学学研究, 2023, 41(4): 732-743.
- [13] 李佳霖, 董嘉昌. 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3, 44(9): 47-59.
- [14] 韩文龙, 张瑞生, 赵峰.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6): 5-25.
- [15] 孙志远. 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与机制[J]. 中国流通经济, 2024, 38(5): 28-40.
- [16] 胡海峰, 张焯. 耐心资本如何促进企业向“新”发展? ——基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证据[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5(4): 105-116.
- [17] 王宏利, 申纳川. CEO 特征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研究[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23(4): 28-42.
- [18] 尚路, 李东红, 韩思齐, 等. 产学研合作如何激发数字原生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知识编排视角下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5(1): 174-192.
- [19] 王国成, 程振锋. 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式转换[J]. 当代经济科学, 2024, 46(3): 71-79.
- [20] 蒋永穆, 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 逻辑、内涵及路径[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1): 10-18.
- [21] 温科, 李常洪. 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OL]. 科研管理, 2025[2025-07-10].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567.G3.20250122.1420.009>.
- [22] 李向前, 朱晓满, 王伊攀. 制度型开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验证据[J]. 国际金融研究, 2025(1): 87-96.
- [23] 刘政, 余龙, 匡慧姝. 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 27(5): 36-51.
- [24] 张夏恒.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自然实验[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2(2): 68-79.
- [25] 周密, 郭佳宏, 王威华.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基于补点、建链、固网三位一体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24, 40(7): 1-26.
- [26] 冯佳林, 袁祎开, 孙忠娟. 数字经济政策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5, 46(10): 129-144.
- [27] 曹景林, 郭熠倩, 苏森森. 链主导的产业链治理能够提升新质生产力吗——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22): 13-24.
- [28] 陈邑早, 解纯慧, 王圣媛, 等. 放宽市场准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4, 45(12): 19-28.
- [29] 杜剑, 黎媛媛. 媒体关注度与上市公司气候风险信息披露[J]. 管理学报, 2025, 38(3): 1-16.
- [30] 王蕾茜, 蒋忠莉, 纳超洪. 政府关注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言寡行”[J]. 财贸研究, 2024, 35(4): 97-110.
- [31] KIM T Y, DEKKER R, HEIJ C.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distance effects and express delivery in European Union marke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17, 21(2): 184-218.
- [32] MANOVA K, WEI S J, ZHANG Z W. Firm exports and multinational activity under credit constraint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3): 574-588.
- [33] 韩先锋, 勾亚楠, 肖远飞, 等.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制度创新的力量: 政策协同赋能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4(11): 62-80.
- [34] 宋科, 朱斯迪, 张津硕. 跨境电商、央行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J]. 管理世界, 2025, 41(9): 44-64.
- [35] 谭志雄, 穆思颖, 郑华蓉.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 以“灯塔工厂”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5(6): 28-40.
- [36]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37] 王建, 宋琳萍, 李思慧, 等. 从“试验田”到“新高地”: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十年发展成就、经验及展望[J]. 国际贸易, 2025(8): 36-46.
- [38] 徐学超, 戴明锋. 疫情冲击下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研究[J]. 国际贸易, 2022(2): 32-38.

Cross-Border E-Commerce, Government Atten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for CBEC

GUO Fei¹, GUO Huimin²

- (1.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Abstract: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fosters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nine key tasks for central economic work in 2025. As a key lever for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BEC)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expanding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Addressing the pressing need to understand how digital trade and policy interventions contribute 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trade challeng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for CBEC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aiming to uncover causal effect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dataset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and city-level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from 2011 to 2022, this paper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for the CBEC polic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olicy enhan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within the pilot zon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parallel trend tests and robustness checks. After conducting mechanism test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governance improv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operates by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confirms tha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Based on a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f annual work report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findings further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logistics,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financing, and talent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CBEC pilot policy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In conclusion, CBEC is pivotal for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nderscores this relationship and enriches related research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Moreover,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and extends research on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By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it also offer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CBEC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s of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Future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the expansion of CBEC pilot zones, 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logistics,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financing, and talent, and the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ailored to enterprise- and industry-specific needs.

Keywords: cross-border e-commer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government attention;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digitalization

编校:李 叶